



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中华文学传承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英国文学 研究史论

葛桂录◎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中国英国文学 研究史论

葛桂录◎著



人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詹素娟

装帧设计:东方天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英国文学研究史论/葛桂录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9

ISBN 978-7-01-018200-1

I. ①中… II. ①葛… III. ①英国文学-文学史研究 IV. ①I56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21513 号

中国英国文学研究史论

ZHONGGUO YINGGUO WENXUE YANJIU SHILUN

葛桂录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30.25

字数:500 千字

ISBN 978-7-01-018200-1 定价:8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总 序

2004年10月,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获批建设福建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人文福建发展研究中心,并于2011年评为省高校优秀社科研究基地。在此基础上,学校于2014年4月成立了中华文学传承发展研究中心,聘任郑家建教授为研究中心主任,以更好地发挥文学院在中华文学传承发展方面的科研优势,为我国社会文化发展以及闽台文化合作交流提供智力支持和决策参考。该研究中心于2014年6月经过专家评审,成功晋升为福建省首批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福建省社科研究基地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高层次学术平台,担负着组织科研创新团队、产出重大研究成果、创新科研管理体制机制、提供社会咨询服务、培养优秀科研骨干、促进学科建设发展的重任。省社科基地实行“机构开放、人员流动、内外联合、竞争创新、产学研一体化”的运行机制,经过几年的建设,力争成为国家或省级高层次智库或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中华文学传承发展研究中心依托福建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福建省特色重点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和3个福建省重点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以及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和博士后流动站、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和博士后流动站、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和博士后流动站,以学科发展与

社会重大问题为导向,结合文学院的既有学术传统,确定中心的重大学术课题,围绕国家提高文化软实力与福建省社会文化发展的重大需求,在全球化语境中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

中国语言文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它不但成了联结全球华人共同家园的精神血脉,而且对中华文化在世界的流播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国语言文学在传承中华文明及促进闽台文化的合作交流方面具有其他学科无可替代的作用。福建师范大学中华文学传承发展研究中心的学术宗旨,是以历史和现实为基点,对涵盖古今的中国文学,尤其是闽台语言、文学及海外华文文学的渊源流变进行全方位的梳理,为当前建设繁荣和谐的社会文明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加深两岸人民共同构建精神家园的情感联络,为促进闽台文化交流与中外文化交流作贡献。

研究中心聘任国内著名专家担任顾问和学术指导,对中心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指导。福建师范大学副校长汪文顶教授担任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副校长郑家建教授担任中心主任,研究中心的日常事务工作由常务副主任葛桂录教授负责。本中心的特色研究方向有四个:闽台语言文献与文学交流研究方向,负责人为林志强教授、郑家建教授;文体学研究方向,负责人为李小荣教授;中华文学域外传播研究方向,负责人为葛桂录教授;当代文学教育及语文教育研究方向,负责人为赖瑞云研究员。

研究中心将以国家社会文化发展的重大需求为导向,以研究项目为纽带,以研究方向组成的创新团队为载体,以出精品成果为目标,努力强化特色与优势。联系整合省内乃至国内相关高校、科研机构的学术资源,建立健全协同创新机制,造就一支高水平、结构合理和可持续发展的科研创新团队,打造一个在全球化语境中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的重点研究基地,成为全国有影响力的专门人才库和人才培养培训基地。

为促进研究中心建设目标的实施,我们在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集中出版“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福建师范大学中华文学传承发展研究中心学术集刊”。该集刊主要收录研究中心同仁高质量的个人学术著作。列入研究中心学术集刊首批出版的十本著作,绝大多数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如

《晋唐佛教文学史》(李小荣著)、《中国英国文学研究史论》(葛桂录著)、《冈仓天心研究:东西方文化冲突下的亚洲言说》(蔡春华著)、《明代建阳书坊之小说刊刻》(涂秀虹著,此项为阶段性成果)、《视域与诠释:明代的中古诗歌批评》(陈斌著,此项为阶段性成果)以及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如《台湾诗钟社团及相关组织考略(1865—2014)》(黄乃江著)、《〈说文解字六书疏证〉研究》(李春晓著)、《阿瑟·韦利汉学研究策略考辨》(冀爱莲著)的结项成果。这些成果在课题结项评审专家审定意见的基础上,再次打磨修订,因此保证了较高水准的学术质量。研究中心成员承担的福建省社科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的结项成果,也拟列入这套学术集刊出版。另外,本研究中心与文学院合作还搭建了两个学术平台《细读》、《圆桌》,研究成果亦由人民出版社刊行,为国内外学者诠释中华文学经典、探讨重大理论问题、思考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方向提供重要的学术阵地。

中华文学传承发展研究中心

2016年8月

目 录

CONTENTS

导论 中国的英国文学研究史:视野、方法与路径 / 1

第一章 他者之镜:英国文学在清末民初中国的评论与接受 / 35

第一节 西方传教士与中国近代之英国文学译介 / 37

第二节 王国维对英国文学家的介绍 / 47

第三节 林纾与英国文学的译介 / 65

第二章 交流利用:20 世纪 20—40 年代英国文学在中国的评论与研究 / 77

第一节 中文报刊上的英国作家专号 / 79

第二节 中国现代作家与英国文学的评介 / 114

第三节 中英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的重要收获 / 147

第三章 批判继承:20 世纪 50—60 年代的英国文学研究 / 153

第一节 政治文化生态与英国文学评价标准的确立 / 156

第二节 “批判资产阶级文学”氛围中的英国作家作品评价 / 167

第三节 “文学艺术的春天”:英国文学研究的短暂辉煌 / 203

第四节 莎士比亚译介与评论的新进展 / 208

第五节 中国式的英国文学“经典”作品的诞生及影响 / 213

第四章 兼收并蓄:20 世纪 80 年代的英国文学研究 / 225

第一节 “思想解放”运动与英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化趋向 / 227

第二节 英国经典作家研究的新收获 / 233

第三节 20 世纪英国文学研究的全面启动 / 259

第四节 高校英国文学教学与英国文学史著作的出版 / 267

第五节 中英文学关系与比较研究 / 273

第五章 繁荣兴盛:20 世纪 90 年代的英国文学研究 / 275

第一节 中国学者对英国诗歌的研究成就 / 277

第二节 中国学者研究英国小说的成就 / 294

第三节 中国学者研究英国散文戏剧的重要收获 / 312

第四节 中国学者著述英国文学史的视角及方法 / 321

第五节 中英文学关系与比较研究 / 327

第六章 多元拓展: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英国文学研究 / 337

第一节 英国文学研究的学术总结与综合研究 / 339

第二节 英国文学史、专题著述的丰硕成果 / 345

第三节 中国学者研究英国小说的新收获 / 354

第四节 中国学者研究英国诗歌的成绩 / 385

第五节 中国学者研究英国戏剧的收获 / 393

第六节 中英文学关系与比较研究 / 399

附录一:中国的英国文学研究论著要目(截至 2009 年) / 410

附录二:中国的英国文学研究学术编年(截至 2009 年) / 420

附录三:中国的英国文学研究博士论文举隅 / 453

附录四:用“新的学术眼光”激活“新的史料”

——访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葛桂录 / 468

后 记 / 473

导论 中国的英国文学研究史：视野、方法与路径

一、文献、学术、思想：学术史研究的重要话题

学术史研究——试以中国的英国文学研究史为例——离不开三个核心词：文献、学术、思想，也构成学术史研究的三个层面：（1）有史料的学术史；（2）有思想的学术史；（3）有学术的思想史。在此研究框架里，文献史料学、学术史与思想史形成一个交互作用的阐释网络，互为关联，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发挥学术史研究的学术传承及现实启示价值。以史为鉴、他者之镜的意义才得以充分显现。

（一）有史料的学术史

学术史的基础是文献史料的搜罗考订与编年整理，即首先应在文献层面上予对象（学术成果、学术机构、学人，等等）的学术理论批评以整体性逻辑还原。遵循前辈学者与学界时贤所确立的学术规范，充分借鉴中西学术研究里的历史分析与“推源溯流”等传统研究方法，特别注重中国语境里英国文学研究的原典性文献的搜集、整理及评述。尽可能将这些研究成果放在它形成和演变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动态地考察，分别其主次源流，辨明

其学术价值与理论空间。先进行研究成果的编年汇总;然后进行统计学意义上的分析论证,从发表数量与研究内容(可显示各阶段关注的热点与重点问题)、研究角度与理论方法的应用(可发现各时期主流学术风气的变化规律)等诸方面,系统客观地展示英国文学研究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演变历程。

也就是说,从百年英国文学研究的演化谱系出发,去陈述相关学者及其理论成果为学术研究贡献了什么,及其赖以贡献的知识学背景又是什么?这势必要求在文献学层面下苦功。这方面每一个学术史研究的从业者均能克己敬业,并出现了一批不错的成果。我们现在亟待推进的是采用文献学、历史、传记、接受研究方法,从事个案(作家、作品)的目录资源学研究实践。编撰一批外国作家读本、学习指南之类的著述,参照《剑桥文学指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已引进英文版刊行42种)、《理解〈动物庄园〉:问题、来源和历史文献学生指南》(John Rodden 编著)等文献整理方式,对相关作家的最新成果作全面介绍,构成了解某作家作品研究的最新必读书目文献。这样的学术史成果以重要批评文献的编撰为基础,进而在政府重大科研项目经费的资助下,花费大精力编订某某作家全集,收录迄今所有被发现的作品,包括学术评价类文字,对照多个版本(原著、译著),对每个文本做详细的比对、校勘、注释,成为某外国作家研究最权威的文献资源。

有史料的学术史,解决的是学术史研究中“知其然”的问题,讨论的是学术的演进历程。如果说学术史研究追求的是史、论结合,那此层面在方法论意义上侧重于“史”,构成了点(作家、作品研究)与线的学术史。

(二) 有思想的学术史

从“有史料的学术史”到“有思想的学术史”,要经过“同情之理解”与“批判之阅读”两个步骤。它展示的是一个面、一个时代的学术风貌。在方法论上是史论结合的阐释模式。所谓“同情之理解”,就是要将他们的批评成果放置到具体的历史和思想语境去理解,理解的是“历史的要求”与“思想的认知”如何?“批判之阅读”就是要站在新的历史要求与思想认知

层面,立足于社会发展与文化交流语境,审视他们文学批评的得失与利弊,揭示其包蕴在研究对象之上的思想附加值。这种思想附加值一是文学现象本身即存有,依靠研究深挖得以显现;一是研究者阐释立场的展示,是观念投射的结果。这就进入学术史研究“知其所以然”的层面,讨论的是思想(学术思想、社会思潮)的演进史。

(三) 有学术的思想史

如果说,“有史料的学术史”主要采用的是文献学的方法,旨在陈述对象“是什么”;“有思想的学术史”采用的则是发生学的方法,重在追问对象“为什么”。那么,“有学术的思想史”则采用的是思想史的方法。

学术史课题必须要放置到思想史语境才能得到有效和深入的阐释。思想史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的英国文学研究所展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想象逻辑及情感特质,如何凸显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并思考在不同时代环境与文化氛围中,人们所作出的对英国文学经典及思潮观念的一系列选择。在具体研究中首先根据批评文本的论证逻辑归纳和分析批评的内容、策略、特征和意义,然后从文本语境拓展至思想史语境,由内到外,层层“深挖”,以期揭示批评家对英国作家评述及“声望”利用的深层次原因,从而在思想史语境中深刻理解其学术史价值。这是一个从学术史到思想史再到学术史的阐释和认知过程。

这就形成了一个多面体(立体)的学术史研究层面。体现的更多是他山之石、他者之镜的功效。我们所提倡的英国文学学术史研究中的中国立场、中国观念,才得以突出体现。当然,中国立场、中国观念,并非仅仅是以中国之是非为是非的思维模式,而是在跨文化交流层面上,借助他者(英国文学)看自身文化发展的时空向度,以展示出我们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及其演变轨迹,关注点是中国当下的社会发展,以及与传统文化比较的参照系。借此建立一个学术史研究的公共文化空间,站在公共知识分子的学术视角与秉持的社会责任感基础上,提炼英国文学学术研究进程所展示出来的先进文化价值,增进对大众的启蒙功效。展示的是学术史研究的“知其所以不然”。在横向参照中,思考研究对象(英国文学)为何不是这样?或者反过来说中

国文学为何不是那样?对其学术研究史的梳理,更在于让我们突破自身习以为常的思考方式,提供“别样地思考”的独到视角,更好地发掘英国文学及中国文化自身的有效价值资源,改变当代中国在自我建构上受挫的某些处境,在文化交流中,培植自身文化的繁殖力与适时性。正是在此碰撞反思、沟通交流中,思想观念得以传递,人类优秀文化精神的正能量得以扩散。冯友兰先生说过,历史的继承应体现为“抽象的继承”。中国的英国文学研究,并非是外国某些理论话语在中国的试验场,最终意义上是中英思想的碰撞交汇,以促成中英文学思想的交流互补。

二、英国文学研究史的学术思路与方法视野

在目前国内的外国文学领域,学术史研究已经成为关注热点。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标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研究员主持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大系”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60年”的立项研究。陈众议作为“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大系”的执行主编,在“总序”中指出“学术史研究也是一种过程学,而且是一种相对纯粹的过程学。不具备一定的学术史视野,哪怕是潜在的学术史视野,任何经典作家作品研究几乎都是不能想象的。”^①并特别提出了当前外国文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在后现代主义解构思潮下,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许多人不屑于相对客观的学术史研究而热衷于空洞的理论。学术史研究则是对后现代主义颠覆的拨乱反正,是重构被解构的经典,重塑被抛弃的价值。200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设计启动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计划,“意味着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已开始对解构风潮之后的学术相对化、碎片化和虚无化进行较为系统的清算”^②,这指出了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大的背景和意义所在。而且,学术史研究“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文学研究方法,更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文化积累工程,同时还可以杜绝有关领域

① 陈众议:《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总序,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② 同上书总序,第2—3页。

的低水平重复。每一部学术史研究著作通过尽可能竭泽而渔式的梳理,即使不能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至少也能老实地将有关作家作品的研究成果(包括有关研究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公之于众,以裨来者考。”^①陈众议不仅十分明确地阐述了当前研究外国经典作家学术史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也提供了值得认真参考的研究方法。^②

中国文化语境里的英国文学研究史,在概观其历史发展进程和学术得失的同时,重在讨论特定时期的中国文化因素(特别是政治意识形态、传统的解读方式)如何影响与制约英国文学研究的客观化及成果表述,造成了哪些误读、误释或创造性阐释?立足于中英文学交流史的研究路径及展示出来的观念形态有何普遍价值?根据学界认可的理解策略,异质文学之间的互读研究,基本上是以“不正确理解的形态”进行的。那么,英国文学在中国的研究历程,既折射出中国不同时期的特定文化需要与意识形态诉求,也显示出英国文学在异域文化背景中的接受变异特征。

当然,英国文学学术史课题研究的定位,并非只是英国文学研究成果的资料汇编、综述式的平面展示,而是力求在中外文学交流的宏大背景中,展示不同时期英国文学进入中国的历史现场,将该课题领域的学术研究史,与中国的英国文学学科发展史,以及中国人文思想界的观念史,还有传统学术研究的史料学等结合起来,在体现中国学者以自身的思想文化模子,“重演”(借用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的话语概念)英国文学的行行足迹的同时,拓展英国文学研究在中国的学术空间,使之不仅有学术史的参照意义,也启发研究主体要秉持有学科建构与人文关怀的自觉意识。

学术史研究的思路定位决定着研究的方法视野。中国自古以来就具有学术史研究的传统。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就论述了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清初各学派建设及主要学者成就和清代学者整理旧学的总成绩这三个大问题。他提出编撰学术史的四个必要条件:“第一,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第二,叙某家

① 陈众议:《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总序,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5—6页。

② 另外,经典作家学术史研究的写法还可以参考谈瀛洲:《莎评简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何宁:《哈代研究史》,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学说,须将其特点提挈出来,令读者有很明晰的观念。第三,要忠实传写各家真相,勿以主观上下其手。第四,要把各人的时代和他一生经历大概叙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①该书以“论”说“史”,以“史”证“论”,史论结合的实证方法很值得我们借鉴。同时,还可以借鉴西方新史学的方法论和研究理念,综合运用接受传播学理论、文本发生学理论、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现代性观念、年鉴史学、观念史、微观史学、西方新文化史、文化传递中的误读、误释理论,试图对百年来中国的英国文学研究,作出比较详尽的历史考察和深度的文化阐释。

中国的英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希望能从学术转型与文化转型、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的关系角度,对英国文学研究的时代转型进行观照,阐释其动因、范式与内在机制。同时,针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重点从方法论角度展开研究,包括主体意识与科学态度问题、理论资源的移植与误读误用问题、多学科交叉与学科素养培育问题、强调学术规范与活跃学术思维问题等。同时,从学科建设角度对英国文学研究进行定位,重点关注进入高校课堂的英国文学研究、专门人才的培养、专门的学术团体(全国英国文学研究会)、研究期刊和专门的研究机构等。也尝试从学理高度对新世纪的英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加以展望,对今后的英国文学研究(课题的设定、角度的选取、研究策略的设立)提供帮助,以引起研究界的关注讨论。

另外,关于英国文学的评介研究,对英国文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有何影响?对中国学术研究的现代转型有何推动?对中英文学交流的持续开展有何启迪?中国视角对英国文学研究的利弊问题?英国文学研究的历程,对构建中国的英国文学学科史的意义价值,对英国文学研究的人才培养有何启示作用?中国与英语国家的英国文学研究,在关注重点和角度、层面上有所不同之处,如何理解分析?中国式的英国文学经典是如何造就的?这其中经过了怎样的文化过滤和转换?与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主流文学传统,以及中国译介者和研究者的眼光和视野,有何具体联系?这一连串的问题,也是英国文学学术史研究推进的路径。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55页。

同样,英国文学研究的主体意识、研究热点与研究者的个体生存、学术生态环境、学术评价机制、国家主管部门的项目资助导向等诸种因素的关系,也成为我们进一步考量的内容。借此思考中国的域外文学研究,其特有的身份属性如何妥善把握?本土与他者的关系如何互动,才能获得一种互证互补的兼容态势?而这些对研究者们设定选题、拓展研究空间、评述角度的取舍、学术心态以及成果出版诸问题,有何影响?这些也是我们在客观梳理英国文学在中国研究的百年历程时,可以关注的重点与难点。

小而言之,立足于梳理中国的英国文学学术研究史,着重分析中国学界关于英国文学评述的经验成就、视野方法、问题模式及阐释立场。

其一,提出中国的英国文学评论史研究的总体框架,从整体角度勾勒英国文学研究在中国的百年进程,构建该领域研究的历史脉络与逻辑框架。

其二,拓展中国学者评论英国文学的研究领域。在知识史的视野里,特别关注那些为学界同仁所忽视的研究内容,并可讨论影响中国评述英国文学学术成果的其他环节,如大学教育、报刊书局、学位论文选题、学术团体及学术活动、课题立项指南等。

其三,转变中国学者涉及英国文学评述史的研究范型。在点、线、面式的涉及知识体系角度的综述评价基础上,增加中国语境、历史重演现场、文化交流、学科建构、跨文化比较、学术转型等诸多诠释维度,这是该领域研究进一步拓展的学术趋势,也是我们研究有待期望的目标。

其四,反思英国文学研究之中国视角与中国经验,以及中国研究者身份立场与研究对象的互动关系,提出中国研究英国文学必须有一种时间向度的研究观念,将中国的英国文学研究史理解为中国人文学界在社会变革和学术转型中实现世界性与现代性的过程,这应是学术史研究的最终目标所在。

总之,中国的英国文学学术史研究是一个亟待开垦的研究领域。这要求我们立足于中国的英国文学研究实践,在跨文化交流视野中,综合运用有效的实学研究方法,踏实地从事该课题的研究工作,总结中国的英国文学研究的特点及经验教训,以进一步促进中英文学与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 and 交流。

三、英国文学研究的实学视角与比较视域

实学,本指17—18世纪(明中叶至鸦片战争前)兴起于中国、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的社会思潮。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在研究明清社会思潮时注意选取“实学”的研究角度,这是一种以“经世致用”为核心,以社会改革为手段,以反对程朱陆王末流空谈为学风,以调整社会矛盾为目的的一种学术思潮。也可以说,实学是在儒学经世传统的启迪下,在批判佛学的“空寂”、老庄的“虚无”的过程中,复归儒学元典精神——经世致用的实学风格,它既是一种求实的学风,也有特定的研究对象,是一种与理学相并行、相渗透,又在一定程度上相对立的学术走向。实学属于近代启蒙思想,是对经世传统的哲学扬弃,启迪着人们的近代意识。明清实学思潮中启蒙思想和科学精神这两个基本倾向正是中世纪文化走向近现代文化的突破口。实学理论家们根据时代的需要,创造性地综合发展了儒、道等诸家传统学说,使之具有了崭新的近代色彩。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先进思想家们的文化主张同明清实学思潮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

作为一种特定时代特定氛围里的社会及学术思潮,其研究方法值得我们认真借鉴。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之第十二则,如此评述王氏父子(高邮王念孙及子引之)之著述:“吾尝研察其治学方法,第一曰注意。凡常人容易滑眼看过之处,彼善能注意观察,发现其应特别研究之点,所谓读书得间也。如自有天地以来,苹果落地能注意及之,惟奈端能注意及之。家家日日皆有沸水,惟瓦特能注意及之。《经义述闻》所厘正之各经文,吾辈自童时即诵习如流,惟王氏能注意及之。凡学问上能有发明者,其第一步工夫必恃此也。第二曰虚己。注意观察之后,既获有疑窦,最易以一时主观的感想,轻下判断,如此则所得之‘间’,行将失去。考证家决不然,先空明其心,绝不许有一毫先入之见存,惟取客观的资料,为极忠实的研究。第三曰立说。研究非散漫无纪也,先立一假定之说以为标准焉。第四曰搜证。既立一说,绝不遽信为定论,乃广集证据,务求按诸同类之事实而皆合。如动植物学家之日日搜集标本,如物理化学家之日日化验也。第五曰断案。第

六曰推论。经数番归纳研究之后,则可以得正确之断案矣。既得断案,则可以推论于同类之事项而无阙也。”^① 这治学方法的六步法体现的就是一种典型的实学研究方法。

学术研究的切实推进有待于原创性成果的面世。学术原创不是灵光闪现,更非智力的机巧,而是需要有足够扎实的研究资料与学术基础作为支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也是实学研究。马克思本人并不是先知,而是缜密而敏锐的研究者与思考者。他用四十年时间写《资本论》,大量时间都是泡在大英博物馆里收集、研究和考证各种历史的和现实的材料。在学术史意义上,没有质料层(包括研究资料、研究素材以及研究者的学术习得与积累)的所谓学术“原创”其实是空疏的,更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因为它本身就缺乏历史的维度。可见,坚实的学术积累(研究经验)、足够的资料占有(特别是独立的资料准备)与消化(这需要史识与视野),以及必要的田野考察(还有人生经验的积累),对于原创性学术是十分必要的。

当前,传统的文史研究似乎处于“瓶颈”状态,重复的复制与生产,越来越缺乏吸引力,缺乏引导公众话题的能力。二十多年来引进的新理论、新方法、新观念,好像吃压缩饼干,吞进太多,现在到了要喝一口水、喘一口气的时候了。运用实学研究方法,来消化吸收及修正补充这些来自于异域的理论观念,才能变成自身学术成长的真正动能。

海外汉学家的工作方法,往往以文献为基础。他们最重视的就是将中国和西方同一时代的文本文献,加以对照和分析,促使自己能够提出问题。若从先验的观点出发,注定只能讲些平庸的见解,或者从一开始就走上歧途。正如明末清初哲学家王夫之所言,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论文尽量讲有根据的话,古人所谓“无一字无来处”,提倡的就是一种“实学”思维。

立根于原典性材料的掌握,从文学与文化具体现象以及具体事实出发,从个别课题切入,进行个案考察,佐之以相关的理论观照和文化透视,深入地探讨许多实存的、丰富复杂的文学和文化现象所内含的精神实质及其生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收入《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53页。